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五卷 第一期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 學術論著 第41頁~56頁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OLUME 5, NUMBER 1, FEB. 1990, RESEARCH, pp. 41~56

## 東西的意義與環境轉變

畢恒達\*

The Meaning of Objects in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by

Herng-Dar Bih\*

### 摘 要

本文根據在紐約的台灣留學生所做的訪談，探討東西在環境轉變時所具有的意義。文末則描述了作者對人與東西的交互關係的一些觀點。

### ABSTRACT

Based on fourteen interviews of Chinese students from Taiwan, the meaning of objects in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discussed. The objects which students carried with them, left behind, and new objects were dealt with. The objects wer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continuity. Five cases showed how the totality of objects was embedded in the student's whole life. At last, a tent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persons and objects was described.

民國78年7月28日收稿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系博士班學生

Manuscript received on July 28, 1989.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ogra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 前言

大多數的心理學文獻都只處理人際以及人的內在心理歷程。實質環境被認為與人格成長及社會行為無關（Searles, 1960; Graumann, 1974）。雖然近二十餘年來，實質環境逐漸受到心理學者的重視，但是人與東西的交互關係仍然是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

何謂「東西」(object)呢？根據企鵝版的心理辭典，東西意指：“1. 廣泛的說，指任何東西(anything)。2. 在知覺及認知的研究裏，指人所知覺的一個環境的一個面相……。3. 目的……。4. 根據心理分析理論，指行為、思想及欲望所指向的人、人的一部份、或此二者的象徵……這些意義涵蓋了很大的範圍，從實質的到知覺的、概念的、象徵的以及從無生命的到人類的”（Rebor, 1985: 483）。為了使此研究能夠操作，我將東西的定義限制於指具體可以觸摸、無生命、以及可移動的東西。因此，東西不包括詩歌，除非它具有物質的形式；也不包括房屋，除非人們能夠將之從甲地搬至乙地。

在回顧有關東西的文獻之前，必須先探討幾個東西（如以上之定義）所具有的特性。

1. 東西的實質可觸摸與耐久性使之有別於人類的行動。口語及非口語行為瞬間即逝，但是東西卻相對地轉為持久。“東西有助於記憶，幫助人們確保溝通的連續性”（Foote, 1988: 245）。“朋友離去了，但他們的信件是他們相互尊重的具體見證。親屬雖去世了，但仍然在相簿裏微笑”（Tuan, 1977: 187）。

2. 東西與環境並不容易區分。研究東西並不意謂將人與東西視為二個分離的個體。人與東西的交互作用牽涉多重感官形式的過程。東西所具有的意義與人的行動及理想是不可分割的（註1）。拉普普（Rapoport, 1982）延用霍爾（Hall, 1966）的概念，將環境分為固定（fixed-feature）、半固定及非固定等三個元素（註2）。本文所界定的東西較接近拉普普所提的半固定元素。但是東西和環境是存在於一連續體的。書牆、貼滿照片、獎狀及其他紀念物的牆、以及房屋裏的其他傢俱都能予人圍繞的感覺（McCraken, 1987）。控制性是另一個課題。人們大都搬進一個已經固定的環境（房屋的結構與配置），很少去改變它，但人們利用東西以賦予新環境自己的個性。因此，半固定環境在環境意義的研究裏顯得特別的重要（Rapoport, 1982）。

3. 東西的實質特性在人們的東西體驗裏扮演不同的角色。東西可以是工具或目的本身，但通常具有多重的功能與意義（Graumann, 1974）。報紙及音樂帶是媒介。人們所尋求的是資訊或音樂，而不是“紙”或“卡帶”。但是玩

具熊、雕塑、或盆栽的物質特性卻是東西體驗中很重要的因素。現實總是較為複雜的。電視傳送資訊，但電視機可以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而電視機的存在也可能影響了家庭裏的互動模式。禮物的物質特性是任意的也是唯一的。人們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禮物，但禮物一旦送出去，也正因為如此，它就是無可取代的（Baudrillard, 1981）。

東西是不同領域的共同研究課題。經濟學家研究物品的需求與供給；社會學家對消費的地位象徵功能感興趣；物質文化的研究者試著從具體可見的東西以瞭解文化。但是在生活世界中人與東西的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卻仍是有待研究的課題。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東西在人們生活中的顯著意義及此意義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脈絡裏的改變。我們著重於意義的社會心理向度，接著我將回顧主要的理論及經驗研究。

## 壹、東西的文獻回顧

### 一、心理分析

非人類環境並不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興趣。對於佛洛伊德而言，人的生活是被社會與人際環境所引導與形塑，東西只是性心理的需求與衝突的外在表現。它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東西的內在性質被化約成人或身體的一部份。

溫尼寇特（Winnicott, 1971）關心幼兒對毛毯與玩具動物的黏結，並提出過渡性東西（transitional object）的概念。對於一個嬰孩而言，過渡性東西是存在於環境裏，也同時是嬰兒所創造的。它聯結內在與外在、虛幻與現實，是由絕對主觀通往客觀的中介區域。至於東西在成人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則仍不清楚。

西羅斯（Searles, 1960）引用臨床資料說明非人類環境（nonhuman environment）的重要性。他舉出幾個人與自然或人為環境維持成熟關係所帶來的心理益處：1. 紓解各種痛苦或焦慮的感覺。2. 促進自我瞭解。3. 加深對真實的瞭解。4. 加強對同胞的接受與尊重。雖然他也舉出東西在人類成長過程中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如在遊戲中增進兒童的靈巧、想像力與分辨能力，以及居住在熟悉的環境裏帶來的安全感，但是其隱含的假說仍反映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即人與非人類的關係是幼兒人際經驗的結果。

### 二、控制性與自我

心理分析理論說明了幼兒經驗的重要性，但忽略了兒童成長過程中的東西的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of objects）。大多數有關“實質環境與兒童的發展”的研究則集中於環境（或東西）的多樣、複雜與反應程度對兒童心智與操作發展的影響（Wohlwill & Heft, 1987）。弗比（Furby, 1978; 1980）的研究也處理兒童的成就感的問

題。她探討控制感與社會化過程對自我的形塑的貢獻。根據對不同文化（美國與以色列）的人們的訪談，她舉出擁有（possession）的動機與意義決定於人的實現與成就感，而個人與環境限制的互動影響了擁有與自我概念的形。當幼兒的行為能力增加時，成人或兄弟們常干預其與東西的互動以防止兒童間的爭吵或東西的損壞。兒童因而學著分辨我的、你的、或他的；並分辨自我與非自我。弗比也提出擁有是自我的延伸與社會權力、地位的表徵。然而成就感以及他人的干預與限制只是幼兒成長、發展自我的一個因子。未來的研究亦應考慮東西的品質及社會關係的分析。

### 三、東西是地位的表徵

恰賓（Chapin, 1935）嘗試利用四個尺度以決定人們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效收入、物質資產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裏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社經地位。此一分析只顯示客廳的東西與其他指標的相關度。但是以之作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入了定義的循環（Baudrillard, 1981），此研究取向缺乏理論且忽略了東西對於個人的主觀意義。

假設客廳反映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 Bonnes, Giuliani, Amoni, & Bernard, 1987; Duncan & Duncan, 1976;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isner & Weibel, 1981）延用維佈倫（Veblen, 1899）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以及高夫曼（Goffman, 1959）的“前台”（front region）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與社會地位的關係，但是大部份的研究仍然只是尋求獨立變數（社會地位與客廳陳設）之間的相關。只是對於變數的定義較為細緻與複雜而已。他們除了關心社經地位的指標，也探討居民的社會與政治態度（Laumann & House, 1970）。他們不只調查居民客廳陳設的清單，也探討其式樣（Laumann & House, 1970）、佈置方式與維護（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考慮權力結構的社會過程，因此無論其實證之統計關係如何的精密都無法給我們一幅階層社會的圖像（Baudrillard, 1981）。

鄧肯與鄧肯（Duncan & Duncan, 1976）探討不同性質的社會地位以及表達社會地位的不同管道與方式。他們比較美國波士頓與印度的傳統與新興社會精英的家庭消費模式，並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impermeability）以解釋此二團體的差別。傳統精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社會身分。他們有一個極為緊密的社會網絡，因此可以依賴口語以維持其聲譽。但是新興精英處於較為鬆散的社會網絡，因此需要較持久可見的證據，例如住宅與裝潢，以重覆地向不同的觀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盡其資

源。

這些研究代表了社會科學裡的一支傳統，認為在現代消費社會裡，表現社會地位是東西的主要意義。但這些只說明了現實的某一面相。麥克雷肯（McCracken, 1987）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利用東西以營造家的感覺（homeyness），做為對抗地位競爭的堡壘。這個家居環境給予人們凝結與滿足感，並使人們遠離對於權勢的永無止盡的追求。

### 四、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其他有關家居裝飾的研究（Gee, 1988; Hansen & Altman, 1976; Vinsel, Brown, Altman & Foss, 1980）強調個人化而非地位表徵。瑪莉·吉（Gee, 1988）經由訪談發現人們利用東西佈置熟悉環境以表現其自我、控制性、回憶及審美價值。

古柏（Cooper, 1974）採用楊格（Jung）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即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結人們及其原初，而原型——心理能量的節點——必須藉著象徵向外表現。古柏指出住宅（及其內的東西）是自我的基本象徵。她引用社會科學文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正視自己為一獨立個人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然而東西不只象徵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徵了團結認同（Pratt, 1982）。而古柏有關獨立住宅為一普遍、不變的象徵形式的論證則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社會及歷史脈絡的分析。

漢森與阿特曼（Hansen & Altman, 1976）在學期初及學期末記錄四十一間大學宿舍雙人房的室內裝飾。他們發現牆上的裝飾面積隨著時間而增加；而後來退學者室內的個人化裝飾較繼續求學者為少。然而學生對於個人化過程的意向與詮釋卻未受探討。另一個類似的研究（Vinsel, Brown, Altman & Foss, 1980）對於裝飾的數量有不同的研究發現。退學者有較大面積的裝飾，但內容變化較少且對於學校環境較無興趣。這些人也較無能力以有效地控制其私密性，對於日常生活也較不滿意。

儘管上述研究的概念及方法論有限制，但仍值得將之與瓦夫喜、來爾登與瓦坡納（Wofsey, Rierdan & Wapner, 1979）有關大學生的自我/世界的距離的研究（雖然並非針對東西）一起討論。在文索等人（Vinsel, Brown, Altman & Foss, 1980）的研究中，“退學者”的個人化裝飾表現出與過去的生活以及家鄉的親人與朋友較大的連結，而繼續求學者的裝飾則對大學環境有較多的投入。至於在瓦夫喜等人（Wofsey, Rierdan & Wapner, 1979）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對於畢業後有明確計畫的大四學生與所處的環境有較大的自我/世界的距離。這些學生就心理上而言已經先離開學校的環境了。這些研究顯示人與環境的關係不只牽涉現在的經驗。而一個人的過去的記憶，現在

的體驗與未來的夢想與構成其環境的東西是無法分割的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我們對於過去事件的詮釋決定於在當今的處境中所提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排定又取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望 (Palmer, 1969)。因此為了瞭解東西的意義，我們必須將之放入時間的向度來考量。

#### 五、心愛的東西 (Cherished objects)

有些研究者研究家庭或機構裡的個人東西做為個人自我、社會關係與回憶的表現，而不只是社會地位的表徵。鄧肯與鄧肯 (Duncan & Duncan) 研究富有的家庭，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根據其價值以佈置他們的家 (Kron, 1983)。羅曼與浩斯 (Lauman & House, 1970) 研究客廳裡的東西，假設是對外展示的地方。相對地，有關心愛東西的研究著重在受訪者認為有意義、有價值、或重要、特別的東西。這個東西可以在客廳、臥室、廚房或其他地方，也較不受居民經濟能力的限制。東西的意義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 與特別的東西 (Oury, 1987) 是這方面較有系統的二個研究。

西克斯忍特密哈義與洛克伯格——霍頓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 訪問了芝加哥都會區的八十二個家庭。受訪者包括黑人與白人，中上與中下階級。每一個家庭裡，訪問父母二人，以及至少一位祖父母與一個小孩。受訪者舉出家中他們所心愛的東西，以及為甚麼這些東西是特別的、甚麼時候以及怎麼得到的、如果失去這些東西會如何。整體而言，作者發現小孩與男性成年人較常提到有關行動 (action) 的東西，而老年人與女性成年人則偏愛沉思 (contemplation) 的東西 (註3)。然而同一家庭裡的異同，作者則未加以探討。此外，作者關於人們消費即目的 (terminal consumption) 的結論也與其研究發現不符。事實上，當人們年齡漸長時，東西被視為社會關係的一部份，而不只是為了個人的自我。

奧莉 (Oury, 1987) 利用開放式問卷調查高中生與大學生從小到大曾經是特別重要的東西。作者取揚格的概念將東西之所以特別的原因分為經由思考 (thinking)、知覺 (sensing)、感覺 (feeling) 與直覺 (intuiting)。作者並且確認意義轉化的主題，探討東西之性質與意義的關係。她也發現性別間的差異。女性對個人及家庭的東西 (如洋娃娃、珠寶、及家俱) 較感興趣，而男性對外面世界的東西 (如運動器材與槍) 較感興趣。

這二個經驗研究只研究受訪者所提到的特別的東西。作者描述並對這些東西加以分類，但是對於人與東西的交互關係的動態過程卻未仔細的處理。

#### 六、總結

基於臨床的資料，心理分析理論說明了東西的象徵意義的重要性，但是研究者並不關注東西本身或人對東西的

具體經驗。東西只是心理需求與衝突或集體潛意識的外在表現。東西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動且靜態的。社會學家對東西的研究集中在東西的社會地位的象徵。大多數的研究是描述性的。中上階層的人被視為東西的擁有者。權力關係與象徵操縱的過程隱而不見。有些研究者則指出社會流動較快的人以及暴發戶對於東西式樣的變化較為敏感。

有關心愛東西的研究 (Hansen & Altman, 1976; Kalymu, 1983; Millard & Smith, 1981) 則大都反映了互動論 (interactionalism) 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將現象分割成二個獨立變項，(1)環境：東西；與(2)行為：滿意度、適應或選擇；然後求此二變項的相關度。東西意義的脈絡及動態過程則被忽略，東西的意義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 與特別的東西 (Oury, 1987) 雖然提到東西意義的變遷，但整個研究仍著重在意義的描述與分類。

## 貳、留學生經驗的文獻回顧

為了解人與東西的交互關係，留學生的生活經驗將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其原因有二：(1)出國留學造成社會實質環境的改變。(2)出國留學是一個主觀的生命階段 (subjective life stage) (Stokols & Shumaker, 1982) (註4)。經由對此現象的研究，可以探討東西意義的變遷。

有關留學生的文獻，主要包括對文化衝擊 (Byrnes, 1966; Guthrie, 1966; Higbee, 1969; Oberg, 1960; Smalley, 1963)，適應階段 (Adler, 1975; Gullahorn & Gullahorn, 1963; Lysgaard, 1955)，個性 (Fong & Peskin, 1969)，社會互動 (Furnham & Alibhai, 1985; Hull, 1978; Kang, 1972)，以及其他背景、境況變數 (Galtung, 1965; Hull, 1978) 的研究。

文化衝擊 (Oberg, 1960) 意指熟悉的溝通系統的失落或扭曲所導致的不愉快的壓力。研究者提出不同的問題，如地位的失落 (Byrnes, 1966; Higbee, 1969) 或語言的問題 (Smalley, 1963)。由於語言是最基本的溝通系統，因此外語能力有問題的留學生無法表現他們的才智，使得舉止反應有如小孩一般。而有些留學生或交換學者在本國已有受人尊敬的地位或職業，因此對於在留學地被視為只是“學生”感到非常的沮喪，除了文化衝擊以外，研究者也探討留學生適應過程的型態。他們提出U形曲線 (Lysgaard, 1955) 與W形曲線 (Gullahorn & Gullahorn, 1963) 以描述適應的過程。U形曲線描述了留學生初到外國的興奮與好奇，地主國居民的熱心接待，但是緊接著留學生開始遭遇到學習、語言、居住與交友各方面的問題，然後漸漸地加以解決、適應。W形曲線則說明留學

